

王道文化與二十一世紀大中華的道路⁺

黃俊傑^{*}



引言

在二十一世紀的諸多發展趨勢之中，中國大陸的崛起是最為重要而且關乎全球局勢的大事。在三十年改革開放，經濟突飛猛進的基礎之上，中國大陸在國防、政治與外交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雖然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問題仍然紛至沓來，層出不窮，但是，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現在的中國大陸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明治維新成功後的日本，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之上：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的道路，到底是走在最近兩百年來西方列強霸道的道路？或是走在具有傳統中國文化特色的王道道路上？中國大陸的抉擇將決定大中華文化圈的命運，也將決定未來人類的命運。

不論是從源遠流長的傳統中華文化核心價值來看，或是從二十一世紀世界新局勢來看，包括大陸、臺灣、港澳地區在內的大中華文化圈，在二十一世紀必須以「王道文化」為其歷史的道路。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於分析「王道文化」的淵源、內涵以及二十世紀孫中山（1866-1925）的新闡釋，並論證二十一世紀大中華文化圈的前途正是在於「王道文化」的實踐。

為了有效地論證本文主旨，本文將扣緊以下三個問題展開討論：

1. 什麼是「王道文化」？孟子與孫中山如何詮釋「王道文化」？
2. 為什麼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途在「王道文化」的實踐？

⁺ 本文係 2011 年 12 月 2-3 日由中央大學、中華文化總會主辦，本院協辦之「王道文化與公義社會」研討會中發表之文章。

^{*}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本院院長。

3.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大中華圈實踐「王道文化」？

「王道文化」的內涵：從孟子到孫中山

所謂「王道」雖在古代經典如《尚書》就有「王道平平」、¹「王道正直」、²「王道蕩蕩」（以上均出自《尚書·洪範》）³之語，但提倡並充分論述「王道」政治論者則是孟子（372?-289?BCE）。⁴ 孟子生於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14》），⁵ 他痛感「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孟子·公孫丑上·1》），⁶ 他高唱「王道」政治論，實係針對戰國時代之政治現實而發。孟子所謂「王道」，指「先王之道」（《孟子·離婁上·1》），⁷ 以道德為基礎（《孟子·公孫丑上·3》：「以德行仁者王」⁸），以民本為依歸（《孟子·梁惠王上·7》：「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⁹）。「王」與「霸」的對比，是「德」與「力」的對比，也是「公」與「私」的對比，更是「義」與「利」的對比。孟子遊說各國國君，尊王黜霸，孟子所尊之王並非業已日落西山之周天子，他鼓舞野心勃勃的戰國國君推行仁政，拯生民於水火之中。孟子的王道政治論因襲民貴之古義，創造轉化，明確標舉以人民為政治之主體的主張。

孟子的「王道」政治論的核心在於「不忍人之心」，他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6》），¹⁰ 他勸誡戰國時代的君王只要將人與生俱來的「不忍人之心」加以推廣、擴充、實踐，就能開創「不忍人之政」，就能達到「仁者無敵」的境界。

孟子的「王道」政治一直是二千多年來中國政治思想中最高價值理念。在中國歷史上，崇文而不尚武一直是統治者與知識分子所嚮往的境界。二十世紀偉大史學家錢穆（賓四，1895-1990）先生早就指出：在中國史學名著中最受重視的是文化價值的傳承者與實踐者，如伯夷、叔齊、孔子（551-479BCE），而不是戰爭殺伐中的英雄人物。¹¹ 孔子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1》），¹² 中國歷代政權所重視的是文治而不是武功，在對外關係上也多半強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不是武力的征服，體現一種「王道精神」。

中國文化中的「王道精神」，到了二十世紀的孫中山（1866-1925）獲得了最充分的發揮。孫中山在1924（民國13，大正13）年11月28日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所等五個團體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極為轟動。

1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頁120。

2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20。

3 屈萬里：《尚書集釋》，頁120。

4 我在拙著曾有所討論，參考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第六章：孟子的王道政治及其方法論預設〉，頁161-187。

5 〔宋〕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83。

6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28。

7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75。

8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35。

9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07。

10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37。

1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選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3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頁81。

12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170。

孫中山在這場演講中，首先稱許十九世紀末年日本廢除不平等條約可視為亞洲復興的起點。接著，孫中山比較歐洲文化與亞洲文化，認為歐洲文化是科學的與注重功利的文化，是一種霸道的文化；而中國文化講求仁義道德，是王道的文化。在孫中山眼中，1920 年代的世界問題，就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與衝突的問題。最後，孫中山強有力地呼籲：「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¹³ 這次的演講極為轟動，日本朝野皆極為重視。¹⁴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概念與二十世紀初年以降日本知識界的「亞洲主義」論述有關。1903 年美術史著名學者岡倉天心（1862-1913）出版《東洋的理想》英文書，提出「亞洲一體」（"Asia is one"）主張，並指出亞洲文化探求人生之目的而西方文化則追求人生之手段。¹⁵ 但是在隔年所出版的《日本的覺醒》英文書中，¹⁶ 岡倉天心就隱約中顯示從「亞洲一體論」向「日本盟主論」的轉移。在 1920 年代日本的論述脈絡中，作為思想的亞洲主義正

逐漸轉向作為行動以及作為外交戰略的亞洲主義。¹⁷ 1920 年代是中國人口快速增加，都市化與棉紡織業及新聞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¹⁸ 也正是日本最蔑視中國而中日關係最緊張的年代。¹⁹ 孫中山運用當時日本知識界人人耳熟能詳的「亞洲主義」這個概念，但是卻從當時日本的論述脈絡中予以「去脈絡化」，並重新植入 1920 年代中國與日本的政治關係的脈絡之中，延續孫中山從 1918 年以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公開批判，²⁰ 呼應他的〈北上宣言〉，²¹ 呼應 1924 年 8 月 7 日中國國民黨忠告日本國民宣言，批判日本排斥華工。孫中山於 1924 年 11 月 28 日在神戶另一場演講中，也呼籲日本應協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孫中山以「大亞洲主義」呼籲日本揚棄侵略中國的野心，²² 回歸亞洲文化中的王道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具有嶄新的時代意義。

「王道文化」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道路

世界史上絕大多數的地區在從「傳統」邁向「現代」的過程中，莫不經過革命的洗禮，百年中國更是艱苦備嘗。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在西方列強侵略荼毒與革命亂離之中，以血和淚撰寫中國近現代史。

13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收入《國父全集（第二冊・演講類）》（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生籌備委員會，1965 年），頁 312。

14 關於這次演講資料，參看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演講「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1924 年 11 月日本と中國の岐路》（京都：法律文化社，1989 年），尤其安井三吉：〈講演「大亞細亞問題」の成立とその構造〉，頁 1-39。

15 Okakura Kakuzo, *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iroshi Muraoka*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Tokyo: Kenkyusha, 1931). 日譯本可參：岡倉天心：《東洋的理想：特に日本美術について》，富原芳彰（譯）（東京：ベリかん社，1980 年）。

16 Okakura Kakuzo, *The Awakening of Japan* (New York: Century Co., 1904) .

17 參考王屏：《近代日本の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關於 20 世紀日本的亞洲主義之原典資料，參看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 年）。

18 參考狹間直樹：〈國民革命の舞台としての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收入狹間直樹（編）《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國》（東京：汲古書院，1995 年），頁 3-32。

19 山根幸夫：《大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のあいだ》（東京：研文出版，1998 年）。

20 參考陳鵬仁：〈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と日本〉，《華岡外語學報》，第 11 期（2004 年 3 月），頁 1-12。

21 彭澤周：〈中山先生の北上與大亞洲主義〉，《大陸雜誌》，第 66 卷第 3 期（1983 年 3 月），頁 1-19。

22 參考趙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國》（東京：亞紀書房，1997 年），第 6 章〈「吾人之大亞細亞主義」における孫文の對日觀：孫文と大アジア主義〉，頁 189-234。

二十世紀的中國，所經歷的是一個憂患與苦難交織的世紀。公元 1900 年，義和團包圍北京各國使館後，清廷向各國宣戰，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城。1901 年，辛丑條約簽訂，中國淪為西方列強俎上肉。1911 年爆發辛亥革命，滿清覆亡，孫中山 1912 年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但是，民國成立之後憂患繼踵而至，1915 年袁世凱（1859-1916）稱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暴露侵華野心；1917 年，張勳（1854-1923）復辟，接著是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直到 1928 年北伐完成，中國才在形式上歸於統一。但日本軍閥侵華野心日益高漲，步步進逼，終在 1937 年 7 月 7 日，引爆蘆溝橋事件，中國展開全面對日抗戰。從 1937 年至 1945 年，中國歷經八年抗戰，人民流離失所，艱辛遍嘗。抗戰勝利之後，卻又繼之以國共內戰，1949 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府遷臺，從此以後禹域二分。但是大陸人民在經過十年的安定之後，又歷經「反右」（1957-1958）、「大躍進」（1958-1960）、「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一系列的動亂與苦難。

但是，令世人驚奇的是，從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經濟的新興力量。2010 年起，中國的 GDP 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京奧與上海世博的亮麗舉辦，都見證了中國大陸經濟的飛躍發

展。在快速發展的經濟力支持之下，中國大陸高速鐵路的建設規模、里程、速度都已躍居世界第一。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崛起，帶動了亞洲的發展。日本《東洋經濟週刊》曾統計：²³ 1996 至 2005 年的十年之間，亞洲各國之間的航空旅客成長率是 109%，遠超過全球跨洲的平均成長率 60%、亞洲與北美之間的 67%、亞洲與歐洲之間的 59%，以及歐洲各國之間的 36%，海峽兩岸之間的直航班機幾乎班班客滿。而且，全球各地人口超過千萬的十九個大城市中，有十一個在亞洲。亞洲的崛起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可以預期的新趨勢。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中國大陸就像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大正時代的日本一樣，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展望未來，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是走向「霸道」或是「王道」？社會經濟發展是走向求「義」或逐「利」？是走向「公」益或「私」利？中國的抉擇不僅決定大中華圈的命運，也會影響人類的未來。²⁴

從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局勢來看，自從 1989 年前蘇聯崩潰成為獨立國協，柏林圍牆倒塌兩德統一以後，世界政經板塊重組，區域經濟大幅發展。在全球化潮流沖刷之下，民族國家逐漸「解疆域化」。²⁵ 已故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在上世紀末就著書指出：在後冷戰時代，傳統的國與國

23 轉引自張漢宜、辜樹仁：〈全球航空爭霸戰，亞洲佔鰲頭〉，《天下雜誌》，第 378 期（2007 年 8 月 15 日），頁 108-109。

24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未來的動向是美國學界關心的議題，最近有學者檢討從大宋帝國和明帝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關係，指出從 960 到 1644 年之間中華帝國一直是依循國際權力均衡的態勢，而在「和」與「戰」之間移動。作者並推測，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力量較美弱時，中國就會採取守勢，但如果時勢對中國有利，中國會變得較為強勢。參看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litic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相應於中國的崛起，學者對於美國未來政策的建議也頗為分歧。季新吉在最近新書中，認為美國應避免中美雙方悲劇性的衝突，應該面對中國的崛起，以優雅的姿態讓位。參看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0)；但是也有學者指出，美國對於中美兩國利益衝突的領域，應該採取強勢的立場。參看 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 W. Norton, 2011)。

25 貝克 (Ulrich Beck)：《全球化危機》，孫治本（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年），頁 90-91。

之間的戰爭將愈來愈少，未來的戰爭將是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戰爭，爆發點常會是在不同文明之間的斷層線上。²⁶ 杭亭頓的說法雖然仍有許多有待商榷之處，²⁷ 但是他的預測在大方向上是與最近二十年來的世局呼應的。在二十一世紀文明互動與對話的新時代裡，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日益擴張，絕對不應重覆過去二百年來近代史上所見的武力擴張與征服的霸道之路，而應是以文化價值的共享為基礎的「王道精神」。

霸者必亡：歷史的教訓

那麼，如果走「霸道」的道路會有何種結局呢？

最近哈佛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 1964-）在 2010 年 3-4 月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論文，題為：〈複雜性與崩潰：混亂邊緣的帝國〉，²⁸ 指出歷史上的帝國都由很多交互作用的因素所組成的複雜系統，在治與亂之間迂迴前進。他回顧羅馬帝國、中國大明帝國、法國波邦王朝、大英帝國以及前蘇聯都以驚人速度快速崩潰。他最後提出結論，認為大多數帝國的覆亡都與財政之惡化有關。弗格森特別警告美國的財政赤字在 2009 年已高達 GDP 的 11.2%，而公共債務在 2008 年高達五兆八千億美元，預計至 2019 年將高達十四兆三千億美元，他悲觀地預測美國已走到崩潰邊緣。

不僅美國國勢開始走下坡，歐盟的狀況也不樂觀。在 2011 年 8 月 22 日出版的《時代

周刊》就有一篇長文檢討歐元的危機使歐盟瀕於崩解，歐盟的失業率達 9.4%，而美國已無力帶動全球經濟，美國失業率也高達 9.1%。至於歐元區的兩大經濟體德國與法國則尚無力拯救歐元。文章作者 Rana Foroohar 悲觀地以〈歐洲的結束〉（*The End of Europe*）作為他的文章標題。²⁹

弗格森與《時代周刊》對美國與歐洲崩潰的預測也許過於悲觀，但是，最近二百年來大英帝國崩潰與美國國勢的沒落，確實與財政上過度的擴張性支出有很密切關係，而「擴張性支出」的惡化，正是厲行「霸道」政治（如發動對外戰爭）必然導致的結果。這些歷史上的例證，也提醒我們「王道」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意義與新價值。

除了歷史上的大帝國實行霸道的擴張而覆亡的例證之外，亞洲近代史上最具有啟示性的就是日本帝國的快速崛起與敗亡。日本在推翻江戶幕府、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的「明治維新」之後，國力大振，1894 年甲午海戰打敗滿清王朝，一躍而為東亞霸權，在「脫亞入歐」的思想潮流之下，逐漸走上西方列強二百年來的「霸道」的歷史道路，企圖建立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為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至今無法抹去的歷史的傷痕。近代日本「文明開化」的啟蒙導師福澤諭吉（1834-1901）曾說，³⁰ 他那一代的日本人經歷明治維新的大變局，每個人都有兩個「身體」：上半身是「漢學的身體」，下半身是

2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Remar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huster, 1996).

27 Chun-chieh Huang, "A Confucian Critique of Samuel P. Huntington's Clash of Civilization,"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16, no. 1/2 (Spring/Summer 1997), pp. 148-156.

28 Niall Ferguson, "A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Complexity and Collapse,"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 pp. 18-32.

29 Rana Foroohar, "The End of Europe," *Time*, vol. 178, no. 7 (August 22, 2011), pp. 20-25.

30 福澤諭吉：《文明論の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中譯本：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序言〉，頁 3。福澤諭吉本人就是他所說的「一身兩世」、「一人兩身」的代表人物，參看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馬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

「洋學的身體」。我們不妨說：所謂「漢學的身體」就是東方的文化，所謂「洋學的身體」就是西方的文化。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在「洋學的身體」主導之下，走上了侵略鄰國的「霸道」的歷史道路，而終於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日本帝國「霸業都隨劫火殘」（徐復觀詩句）！³¹

其實早在 1924 年 11 月孫中山發表〈大亞洲主義〉演講，正告日本應回歸「王道」的東方文化之前八年，印度偉大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獲 1913 年諾貝爾文學獎）在 1916 年訪問日本時，就在以〈日本的民族主義〉為題的演講中告誡日本：「全世界在等著觀看這個偉大的東方民族從現代手中接受機會和責任以後準備做什麼。如果是單純照抄西方，那麼它喚起的巨大希望將會落空。因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嚴重的問題，但是並未找到圓滿的答案。」³² 泰戈爾進一步指出：日本真正的危機在於以西方的民族主義作為動力，使日本的社會理想敗於政治之手。他呼籲日本回到「不是掠奪的和機械效率的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和以人類各種深厚關係為基礎的文明。」³³ 泰戈爾在 1916 年對日本的期許與孫中山在 1924 年對日本的呼籲前後呼應，都希望日本回歸東方的「王道文化」。但是，從 1920 年代以後日本帝國所走的是棄「王道」而走「霸道」的道路，導致了悲劇性的結局。

「王道文化」在二十一世紀大中華文化圈的實踐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王道文化」的核心價值及其實踐。

孟子所提倡的「王道」，包括兩個核心價值理念：第一，強調分享而不是獨占。孟子所堅持的王霸之別的基礎，就是義利之辨。先秦孔門「義」「利」對舉，崇「公利」而斥「私利」。孔子答子張問從政之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篇·2》），³⁴ 所謂「利者，義之和也」（《易·乾·文言》），³⁵ 皆指「利」之分享才能成就「義」。孟子告誡梁惠王「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³⁶ 啟示我們「分享」正是「王道」政治的核心價值理念。

孟子的「王道」的第二個核心價值在於「推恩」與「擴充」。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6》），³⁷ 其關鍵在於統治者將他的「不忍人之心」擴而充之，例如大禹這種聖王「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孟子·離婁下·1》），³⁸ 所以必須將統治者的愛人之心推擴出去並加以落實。

從「王道」精神的核心價值出發，理想的政治政策是以德治國，正如孟子所說：「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上·3》），³⁹ 這種以「德」而不以「力」的新政治，可以達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梁惠

31 徐復觀：〈東行雜感〉，收入《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 年），頁 252。

32 泰戈爾：《民族主義》，譚仁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30。

33 泰戈爾：《民族主義》，頁 36。

34 朱熹：《論語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 194。

35 朱熹：《周易本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62。

36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 202。

37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 237。

38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 299。

39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 235。

王上·7》)的境界，擺脫「國強必霸」、「霸者必亡」的歷史宿命。「王道」政治必然照顧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福祉，達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3》)⁴⁰的小康社會。

以「王道」精神為基礎的社會經濟政策，必然本於「分享」的價值理念，1950年代臺灣所實施的「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可以作為歷史上的典範，代表孫中山民生思想的初步落實。1924年8月23日，孫中山在廣州對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生訓話，就曾闡示「耕者有其田」政策是保護農民的具體措施，孫中山說：「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⁴¹孫中山對中國農民的處境深致同情，但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紛擾亂離，並沒有給國民政府在大陸上實施土地改革的機會，直到1932年10月，福建龍岩實施土地改革，至1934年6月草草結束。1943年，福建省政府通過「扶植自耕農辦法」，1949年1月實施，但因戰亂而成效不彰。此外，四川省也在1949年初夏，在全省138縣實施減租計畫；貴州、廣東兩省也有零星計畫，但均因戰亂而毫無成效可言。直到1949年3月開始，在臺灣所推動的系列土地改革計畫，才算在歷史上踏下了腳印。1950年代初期臺灣土地改革政策的成功，徹底改變臺灣的土地所有權的結構，自耕農戶數急速增加，1953年自耕農戶數佔全省總農戶數的百分比驟增至54.85%，

1954年佔57.59%，1955年是59.12%。整體而言，1951年至1960年的十年之間，自耕農戶數佔總農戶數的55.92%。而且，自耕地在全臺灣的可耕地總積所佔的百分比也大幅提昇，1952年佔57.24%，但到1953年就一躍而為75.43%。⁴²這種土地所有權結構的改變，創造了強有力的自耕農階級，並隨著農業的復興而帶動工業的發展，為196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的都市中產階級的茁壯奠定基礎，成為1980年代以後推動臺灣的民主化的社會力量。⁴³

結論

在人類歷史第三個千年紀元的第二個十年開始之際，歷史正呼喚著中華民族回歸「王道文化」的正軌。正如毛澤東(1893-1976)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⁴⁴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在「王道」與「霸道」十字路口上的抉擇，不僅決定全體華人社會的動向，也帶動世界的未來命運。只有中國大陸走向「王道」的坦途，人類的和平才獲得保障。

中華文化與社會的核心價值理念就是王道精神。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在1920-1921年來中國一年，他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之問題》這本小書中，雖然感嘆當時中國之式微與喪亂，但是他對中國人之愛好和平、容忍異己、與人為善、喜愛自由、厭惡宰制他人等美德推崇備至。⁴⁵九十年前羅素對中國文化王道精神的推崇，在中國崛起的二十一世紀特別具有深刻的啟示。

40 朱熹：《孟子集注》，收入《四書章句集注》，頁203。

41 孫中山：〈耕者要有其田〉，收入《國父全集（第一冊·三民主義）》（臺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生籌備委員會，1965年），頁248。

42 Rural Economics Division, JCRR, *Taiwan Agriculture Statistics, 1901-1965* (Taipei: JCRR, 1966), pp. 9, 12.

43 黃俊傑：〈土地改革及其對臺灣農村與農民的衝擊〉，收入氏著《戰後臺灣的轉型及其展望》（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年），頁55-70。

44 《毛澤東選集》（北京：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1951年），頁626。

45 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Allen & Unwin, 1972), chapter xi, esp. 195.

在二十一世紀歷史旋乾轉坤的關鍵時刻裡，臺灣實居於極端關鍵性之地位。臺灣島的地理位置極為優越，地處太平洋與歐亞大陸交界，是漢民族海外移民最大島嶼，更是東西文化交流的樞紐，所以在十九世紀末甲午戰爭前三年（1891-1894），池志徵（1853-1937）從上海來臺遊覽，三載之間遍跡全臺，他在《全臺遊記》結語中說：「臺灣雖海外一島，然亦東南七省藩籬，〔……〕臺灣不失則東南半壁屹若長城，臺灣若失則沿海諸省豈遂保百年無事乎？」⁴⁶ 臺灣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重要性，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更是與日俱增。

但是，臺灣除了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文風土的特殊性在於以中華文化為基礎所開展的多元文化，數百年來不同時代的政權與人民，都為臺灣注入了新的文化生命力與活力，共同演奏扣人心弦的文化交響曲。

在臺灣多元文化交響曲中，呈現的主旋律就是潛藏在臺灣的民間社會中，底蘊深厚的「王道文化」。這種以「中道精神」為基礎的「王道文化」，未經十年動亂的摧殘，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汙染」相對而言也較不嚴重，臺灣民間社會中展現充沛的慈心、悲心與愛心，使任何走極端的政治主張或社會經濟政策，無法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這種「王道文化」的傳承，將在二十一世紀隨著大陸的崛起而成為民族復興的精神資源，並成為未來東亞文明的共同資產。

46 池志徵：《全臺遊記》，收入《臺灣遊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臺灣文獻叢刊》第89種），頁16。